

茅茅与肯尼亚政治发展*

[英国] 约翰·朗斯代尔

内容提要 茅茅与肯尼亚的政治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基于对基库尤人的无知和未来的政治诉求，白人对茅茅形成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宗教复兴的和军事的四种观念。经过英国政府、殖民地定居者和茅茅相互间的斗争与合作，英国军队的观点最终占据上风并成为英国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一观点认为茅茅运动有着理性的政治目标，需要从政治而非军事上加以解决，从而最终为肯尼亚的和平与多数人统治扫清了道路。肯雅塔在独立后获得了政权，但他对茅茅的定义使茅茅最终几乎一无所获。

关键词 茅茅 基库尤 保守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 基督教原教旨主义

作者简介 约翰·朗斯代尔 (John Lonsdale)，剑桥大学现代非洲史名誉教授、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曾任剑桥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和英国非洲研究协会会长。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茅茅如此“邪恶”？为什么茅茅的威胁要比马来亚 (Malaya)^①的共产主义者或塞浦路斯的“斗士国家组织” (Ethniki Organosis

* 本文编译自 [UK] John Lonsdale, "Mau Maus of the Mind: Making Mau Maus and Remaking Kenya",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31, No. 3, 1990, pp. 393-421. 译者在此向对初稿提出修改意见的匿名评审专家表示感谢。编者认为，茅茅运动是20世纪50年代肯尼亚人民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武装斗争运动。由于立场和视角的不同，国际学界对于这场运动的评价始终存在分歧。非洲和中国学者持肯定态度，而英国及一些西方学者则渲染其“残暴和野蛮”而加以否定。本篇论文深入剖析了茅茅运动前后肯尼亚白人阶层内部的想法，以及从现代化的视角论述了肯尼亚殖民后期的黑、白种族关系，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看法。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代表作者的个人学术观点。

① 马来亚是马来西亚西部土地的旧称。——译者

Kyprion Agoniston, EOKA) 小很多, 但人们认为它更加残暴? 为什么在英国人的记忆里, 茅茅已经成为非洲人“野蛮”的标志? 为什么现代肯尼亚人对茅茅的形象、军事民族主义或地方民族主义持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有鉴于此, 本文拟对人们对茅茅所持的一些观点进行研究。

茅茅运动简况

殖民政府最初获悉这一运动是在 1948 年, 当时白人定居农场的基库尤佃农“斯夸特”(Squatter) 再次发生动乱。1950 年, 茅茅被禁止。1952 年, 白人农场、内罗毕的贫民窟和基库尤保留地相继发生暴动。10 月, 新任总督艾弗林·巴林(Evelyn Baring) 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乔莫·肯雅塔连同其他 180 人遭到逮捕。在经历了最初的混乱后, 茅茅变成了难以对付的游击队。尽管英国人当时占据军事上的优势, 但他们在 1954 年初之前一直没有赢得主动, 直到 1956 年才最终结束军事行动。^①

我们并不清楚遏制茅茅与向多数人统治让步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但下述 3 个巧合似可表明二者密不可分。首先, 为了尽快结束战争, 白人在 1954 年改组政府, 极不情愿地任命了第一位非洲人部长; 而在两个月前, 军队刚刚肃清内罗毕的茅茅。其次, 1957 年 3 月举行了第一次非洲人大选, 这距茅茅领导人德登·基马蒂(Dedan Kimathi) 被绞死只有一个月。最后, 在 1960 年 1 月结束紧急状态的时候, 代表们正前往伦敦参加承诺实现非洲人统治的大会。右翼定居者的领导人布里格斯(Briggs) 宣称这一对肯尼亚的重构是“茅茅的胜利”。^② 他的支持者感觉被自己臆造的“恶魔”打败了。

白人的无知及其对茅茅的想象

本文并不是为了解释茅茅或其与非殖民化之间的联系, 而是如何解读这一事件。在确定茅茅是什么及如何改变历史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它是如何在知识层面被构建起来的, 因为在表面团结的战争背后, 则是各种关于茅茅的

^① 关于战争的简要经过, See Anthony Clayton, *Counter – Insurgency in Kenya 1952 – 1960*, Nairobi, 1976.

^② George Bennett and Carl Rosberg, *The Kenyatta Election: Kenya 1960 – 1961*, London, 1961, p. 22.

神话。茅茅主要是一场基库尤人的运动，但白人对基库尤人的社会知之甚少。很少有人会说基库尤语，大多数人都满足于了解“任何人都了解的东西”。白人的无知由此被建构了起来。对他们而言，基库尤只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地方民族”。

基库尤人长期以来都是一个零散的地方性社会集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日渐分化出了相互敌对的群体。他们对政治忠诚的宣誓反映了这种变化：大多数人仍然奉行传统的入会仪式，但有些人开始对那些他们通常不认识的人保持隐秘且具有派系性的忠诚。然而在争夺忠诚的斗争中，对作为激进分子的茅茅而言，其权力与能力并不匹配。这是一场灾难，因为一旦这种不匹配发展到极端，所带来的必然是政治恐怖。

为更好地了解对方，白人对茅茅形成了4种相互矛盾的观念，即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宗教复兴的和军事的观念。为了在恐怖时期活下来，他们用“白人至上”的假设掩盖了这4种观念间的分歧。他们诅咒所有被视为茅茅野蛮行为的东西都必须被摧毁，从而维护了一个平复叛乱的联合阵线。但他们在民事救济方面产生了分歧，而正是这一分歧主宰了他们对茅茅起因的看法。而且战争行为也存在争议，因为总有一只眼睛盯着构建和平。随着和平临近，人们再次需要直面未来的时候，联盟却崩塌了。这一局面源于战争所取得的胜利令人怀疑，因为对于定居者而言，他们已经开始依靠与各种想象的肯尼亚人，如与“忠诚的地方民族”的首领结成靠不住的联盟。^①

当白人为团结而谈判的时候，基库尤人却因镇压而被迫团结在了一起。由于所有基库尤人都被当作叛乱分子，许多欢迎紧急状态并认为它可以抵御恐怖的基库尤人的“幻想破灭了”。这导致基库尤人对白人产生了刻骨仇恨，而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们当中只有很少的人支持茅茅。^② 这种观点属于对茅茅的自由主义建构。但许多定居者认为，截至1952年10月，已经有超过80%的基库尤人参加了第一次宣誓仪式，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与他们的同胞保持一致或出于对他们的恐惧，而非对白人的恐惧。^③ 这反映了保守派的观点，即恐惧是基库尤社会所固有的东西。对这一运动发展情况的估量与未来的政治

① 米切尔（Mitchell）总督曾警告定居者说那些“忠诚的人”将在战后完全改变他们的立场。See Sir Philip Mitchell, *African Afterthoughts*, London, 1954, p. 268。

② Kingsley Martin, “Kenya Report”,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London, November 15, 1952.

③ Rob Buijtenhuijs, *Essays on Mau Mau*, Leiden, 1982, pp. 35-36.

诉求紧密相关，在紧急状态之前加入的人越多，基库尤人就越会是一个丧失所有预期自由的“犯罪集团”。相关数据支持了自由派的观点，即在肯雅塔被捕之前，白人农场或内罗毕只有一半的基库尤男人参加了宣誓，而吉安布保留地则还不到20%。后一组数据在紧急状态的最初5个月增长了一倍多。^①

当基库尤人因白人的暴力行为而被迫加入茅茅的时候，政府却仍然通过武装基库尤酋长和警察，从而将基库尤人划分为茅茅和“效忠政府”的抵抗力量。酋长成了“骑墙分子”，那些在胁迫下加入茅茅的酋长，同样在威逼利诱下建立了基库尤警卫队。新加入警卫队的人必须通过公开忏悔和传统的净化宣示来证明自己的忠诚，^② 叛乱者也在最初几个月用更加强大的宣誓来聚集力量。^③ 一场基库尤人的内战似乎在所难免。但双方的许多人都竭力避免因世仇而陷入疯狂的战争。尽管基库尤警卫队所杀害的茅茅比其他任何组织都多，但有些地方的警卫队却与叛乱者共同保持了当地的和平。另一方面，茅茅的领导人也宣称要让暴力从属于当地的社会责任。因此当战争结束时，许多人都因参加战争而感到羞耻。

传统观点与个人疑问

当时白人是如何公开谈论茅茅的“邪恶”的呢？传统答案由三部分构成：它的领导人“背信弃义”，它的仪式充满“兽性”，它的杀戮极其“野蛮”。

美国记者约翰·甘瑟（John Gunther）曾称茅茅的杀戮“众所周知异常残忍”，受害者可能会因安全原因而被“肢解成碎片”，或出于迷信而被挖走双眼。^④ 还有人将枪伤当作大砍刀的刀伤。但对茅茅的受害者进行的调查表明，肢解实际上非常少见。威尔金森博士对210具尸体的研究表明，确实许多尸体有很多伤口，但这些伤口一般都不致命，致命伤通常为头部受到6次重击。似乎叛乱者曾接受培训，以“迅速和确凿无疑地结果他们的受害者”。^⑤

① 格雷特·科尔莎（Greet Kershaw）指出，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肯雅塔受审期间，有很多人加入了茅茅。See Greet Kershaw, *Mau Mau from Below*, Ohio, 1996.

② S. H. Fazan, *History of the Loyalists*, Nairobi, 1961, pp. 12 - 16.

③ Donald L. Barnett and Karari Njama, *Mau Mau from Within*, London, 1966, pp. 153 - 197.

④ John Gunther, *Inside Africa*, London, 1955, p. 361.

⑤ J. Wilkinson, “The Mau Mau Movement: Some General and Medical Aspects”, *The East Africa Medical Journal*, Vol. 31, No. 7, July, 1954, pp. 309 - 310.

整体伤亡人数也与甘瑟所描述的完全不同。根据官方数据，在战争最为活跃的4年间，茅茅共有12 590人死亡；同期有164名军人或警察被杀，其中大部分为非洲人。茅茅杀死了1 880个平民，除58人外都是黑人。^①这是一场悲剧，但考虑到他们的目标分布在全国各地，且在没有灯的晚上很容易遭受攻击，这一数字可能并不是很大。总体而言，茅茅的杀戮相当克制，他们杀死的人还不到自身死亡的1/6。

至于宣誓，官方和记者以欲说还休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耸人听闻的解读。有报道称，新加入者在宣誓时要吃用羊肉、蔬菜和谷物炖在一起的东西，浑身涂上油，旁边放的是穿在荆棘上的绵羊眼球。还有报道称，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叛乱者陷入绝望，宣誓变得更加恐怖。但许多作家并未诉说详情，他们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警察在审问犯人时也可能让他们编出更多的故事。^②然而尽管如此，仍有许多白人继续雇用基库尤人。不管白人在公开场合说了些什么，他们私下的行为似乎表明跨种族信任和工资关系比任何宣誓都要强大。^③

社会的解体与非洲人的转型

路易·利基（Louis Leakey）认为，宣誓所具有的“邪恶”力量来自于强大的传统和对传统故意违背的矛盾之中。传统的合法宣誓是负责任的成年人的自愿行为，宣誓在证人面前公开举行，宣誓者需与亲属达成一致。相反，茅茅的宣誓则通常遭到胁迫，在晚上不点灯的茅屋里举行，在场的人都不认识，也没有亲属的同意。利基后来在简单提及宣誓仪式的时候，又强调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新加入者在宣誓前必须爬过由甘蔗和香蕉叶搭成的净化拱道，这相当于再次经历从粗心的年轻人到千锤百炼的成年人之间的旅程，而这在传统上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他认为这必然会使人产生巨大的震动。^④

① Colonial Office,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origins and growth of Mau Mau (Corfield report)*, Cmnd. 1030, May 1960, p. 316; Clayton, op. cit., p. 53.

② Josiah M. Kariuki, *"Mau Mau" detainee*, London, 1963, p. 33.

③ KNA, Rift Valley Province Annual Report, 1953, pp. 2, 16; L. S. B. Leakey, *The southern Kikuyu before 1903*, London, 1977, Vol i: p. 24, Vol ii: pp. 691 - 692; H. E. Lambert, *Kikuyu Social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London, 1956, pp. 53 - 4.

④ L. S. B. Leakey, *Mau Mau and the Kikuyu*, London, 1954, pp. 77 - 81.

让利基感到困惑的是道德与社会范畴的混合，而在此前基库尤人的文化里，二者在创造秩序的过程中是分开的。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茅茅是文化衰败的产物；更加关注宣誓的工具则是保守主义的立场，即基库尤人是野蛮人。但利基可能已经接近了真相，即基库尤人所面临的暴力问题已经无法通过传统仪式来加以控制。茅茅的反抗植根于不同的法律地位、性别和代际的人们之间的混乱；植根于颠覆在道德上负责任的合法标准，转而被迫服从未知的意志。通过颠覆秩序或渗透在自然或社会领域被构建起来的界限，疾病进入了社会、身体和心灵，但茅茅给白人带来的全部危险同样也带给了他们的肯尼亚同胞。背叛的本质是社会解体。但如果各个族体都濒于崩溃，白人至上还能存在下去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殖民地世界建立在对社会分离的心理建构之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被按照种族区分开来，不同的被统治者也被按照族体区分开来。但殖民统治、货币和基督教要想创造“有用的市民”和“勤劳的资产”^①，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变革，根除不同群体间的藩篱。然而如此一来，非洲人便侵入了白人的世界并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世界。“去地方民族化”和“半教育化”都陷入失败，如何在社会沙滩之上构建政治安全和政治道德成了一个广受争议的问题。保守主义者认为非洲人天生野蛮，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他们是智力迟钝的儿童。前者认为需要通过“改造”的方式来建立秩序，即支持被改造的各族权威人士为实行种族隔离的地方政府堵枪眼；后者则相信“同化”，即用受教育的、西方化的非洲人的自律来代替外部控制。同样，有人认为要用镇压来结束非洲人的动乱，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同化比较廉价且最终比较安全。^②

这些界线问题在1945年之后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各政治层面之间都充满了冲突。1944年，利乌德·马图（Eliud Mathu）作为第一个非洲人被提名进入立法机关，但定居者却抵制他的支持者、立场比较温和的肯尼亚非洲人联盟。保留地实行种族隔离政策，但其政治控制所依赖的却是日益强大的非洲

① Norman Leys, *Kenya*, London, 1924, pp. 305 - 306.

② Robert G. Gregory, *Sidney Webb and East Afric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2; B. E. Kipkorir, "The Alliance High School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enya African Elite", Cambridge University Ph. D thesis, 1969; Kenneth J. King, *Pan - Africanism and Education*, Oxford, 1961; Bruce Berman, *The dialectics of Domination*, London, 1992.

人议会。官员们促进发展，但却不相信农民和“改革论者”这两个基础力量。农民和城市雇佣者不承认工会，大多数工人宁愿加入行业组织。白人农场主不再想要佃农，但斯夸特却不想成为自由劳工。定居者召集了警察，斯夸特依靠的则是他们现在视为地方民族的东西。于是，定居者与斯夸特、资本与劳工、阶级与地方民族之间的冲突成为肯尼亚最为复杂的界线冲突。^①

茅茅让人们下定了决心。它触犯了族里控制社会稳定的长者和家长。基库尤人的好战性还破坏、撕裂，甚至主宰了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泛种族城市精英，而他们是唯一可能被同化的非洲人。茅茅因而毁灭了过去并破坏了未来社会控制和多民族国家的图景。警察已经无法熟视无睹，他们要找一個导致这些混乱的替罪羊，即领头的渗透者。肯雅塔成了这只替罪羊。之所以选择肯雅塔，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白人都害怕和厌恶他；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只有他足够聪明，能够发明誓言，而且他还具有领袖魅力，能够煽动茅茅进行宣誓和谋杀。

解构茅茅的“邪恶”是为了重建过去具有道德约束力的知识与权力的界线。人们逐渐发现茅茅并非官方臆造出来压制非洲人合法政治活动的东西，而是应该规范殖民地生活的正确的社会群体关系的病理性图像，因为这些关系已经完全处在了混乱的状态。于是，白人商量出了对非洲人新的固定看法，以求在混乱中带来新的秩序。此前，白人曾认为非洲文化的转型是一个直线的、补偿性的和失与得的进程，但茅茅打破了这一天真的图景。转型现在看起来像是创伤，失去认同似乎导致了催眠式的野蛮。教育并没有使现代人走出过去，相反却创造了没有道德的人，正是这些人操纵了人们内心的恐惧。由此，白人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解释社会的观点，茅茅也因此被通过各种方式建构了起来。

有两种关于界线遭到侵犯的观点控制了战争行为。保守主义者认为种族是最明显受到威胁的界线，但如果这只是茅茅对界线唯一的触犯，那么这个奉行非殖民化的帝国就不应该诉诸战争。要想使白人获得战争的权力，就要对茅茅进行更加隐蔽和更具应用性的建构，而这一任务落到了自由主义者的身上，他们认为种族压迫可能加剧了冲突，但它并非冲突的原因，其原因存

^① Tabitha Kanogo, *Squatters and the Roots of Mau Mau*, London, 1987; Frank Furedi, *The Mau Mau War in Perspective*, London, 1989; David W. Throup, *Economic and Social Origins of Mau Mau*, chapter 5, London, 1987.

在于从过去到现在，从社区到社会，从地方民族到国家转型的创伤中。茅茅当然必须被摧毁，但在顽固分子希望继续使基库尤人远离转型之河的时候，白人自由主义者却知道他们必须渡过这条河，因为只有当基库尤社会处在现代化那边的时候，和平才会降临。

然而这一自由主义的思路并没有赢得和平。在 1957 年的第一次非洲人大选中，现代性、教育和忠诚等措施被用来分配选举权，但以这种自由主义的方式操控未来根本就没有未来。它被非洲人议会的抵制所阻碍，然后因 1959 年初 11 名茅茅拘留犯的死亡而被扼杀。在 1960 年的兰开斯特宫会议上，现代化的自由主义使命被迫让位于艰难的政治谈判。

保守主义者的观点与反应

白人出于恐惧而联合起来对茅茅进行镇压，但在采取何种方式来保证自己的安全这一问题上，他们却产生了分歧。保守主义者希望重拾白人至上和地方民族主义纪律，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如果将茅茅排除出非洲人的观念，就能更加确实地保持白人的控制，而这必然意味着要在种族之间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权。

高地农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特别符合白人至上的原则。高地农场既是英国中产阶级通过努力所获得的回报，也是黑人农民进行扩张的场所；它不仅养活了白人家庭，还养活了无数黑人家庭。殖民统治给高地农场带来了和平、健康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定居者与黑人社区也保持了相对较为和谐的关系。但农场并不太稳定，特别是斯夸特并不是被征服、完全失去自由的人，他们甚至在农场里组建了自己的社区。这种情况在二战结束后进一步恶化。一方面，白人限制斯夸特耕作和放牧，并要求他们付出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农场工人只能获得工资，却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土地。白人与斯夸特间的紧张关系最终导致了冲突。斯夸特抵制新的合同，抱怨定居者充满“罪恶”和“伪善”。许多定居者拒绝或未能否认斯夸特的权利，但他们必须剥夺斯夸特的抵抗的合法性。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使斯夸特婴儿化，宣称“非洲人”“仍然是野蛮人和孩子”，需要用“强硬手段”使他们重新“尊敬”白人^①。他们

^① Uasin Gishu District Council Resolution, April 1947, quoted in Furedi, *Mau Mau War*, pp. 35–36.

以此重新获得了道德阵地。

大多数白人都认为茅茅是武装起来的斯夸特，是忘恩负义的背叛，“是家庭职员叛乱……”^① 下面这个例子即为明证：在最初被谋杀的定居者中，有两个人是为斯夸特家庭提供免费治疗的医生；^② 他们其中一个人6岁的儿子也被杀害。卢阿克（Ruark）在小说《有价之物》中也重点勾画了这方面的事情。^③

保守主义者的反应正是定居者的担忧。它由6根线组成，这六根线形成了一个循环论证。第一根线是冤屈和恐怖。基库尤人没有冤屈；白人居留地曾允许他们殖民马赛兰。既然没有冤情，就必须借助于恐惧。^④ 第二，自1945年以来，“统治者软弱无力的政策似乎激发了被统治者发动叛乱”。^⑤ 野蛮人所尊敬的是强硬，谈论民主是软弱的表现。第三，对于那些不适合实行民主的人们而言，民主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⑥ 看一下他们的历史，人们会发现相互交替的是独裁和混乱。第四，西式教育并没有改进非洲人，肯雅塔的职业表明事实恰恰相反。第五，对斯夸特，以致对所有非洲人而言，强硬甚至强迫是他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最后，答案很简单，欧洲人必须重新恢复统治。

自由主义者和传教士的观点与解决方案

自由主义者并没有像保守主义者那样畅所欲言。殖民事务大臣利特尔顿（Lyttelton）第一次前往内罗毕时坚称茅茅并非因经济压力所致，^⑦ 但他是为了安慰定居者，因为两个月前他的幕僚就讨论了在住房、粮食价格和非洲人在白人高地耕种等问题上的改革并将方案提交给了他。巴林（Baring）称改革是

① Graham Greene, *Ways of Escape*, London, 1980, p. 188.

② C. J. Wilson, *Kenya's Warning*, Nairobi, 1954, p. 56.

③ Robert Ruark, *Something of Value*, London, 1955, pp. 368, 272 - 274; Mugo Gatheru, *Child of Two Worlds*, London, 1964, pp. 7 - 8.

④ Wilson, *op. cit.*, p. 59.

⑤ Stoneham, *op. cit.*, p. 105.

⑥ "The Voice of the Settler", Anonymous Correspondent to *New Statesman*, October 4, 1952, p. 378.

⑦ Lyttelton, Radio Broadcast from Nairobi, November 4, 1952 (transcript in KNA, CD. 5/173); and repeated in his statement to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debates, 5th series*, Vol. 507, November 7, 1952, col. 459.

他的“第二把刷子”，是为了让他的“第一把刷子”——镇压看起来更加得体。这也是一项基本的战术，是为了将温和的非洲人驱赶到极端主义者的怀抱。但当巴林泄漏了改革意向的时候，定居者将其称之为“姑息政策”。因此，官方声明还是遵循了保守主义者的路线。^①

但官方行动完全不同。官方政策面临着两难困境：首先，必须使定居者的影响不再扩大，但也不能让他们因惊慌而陷入骚乱。其次，要阻止茅茅“传染”其他非洲人，因为对其同胞的野蛮镇压使他们群情激愤。^②殖民事务副大臣查尔斯·杰弗里斯（Charles Jeffries）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所有种族的真实的‘中产阶级’，并将其作为国家的基石”。^③虽然此法根本不通，但只有如此才能在殖民主义的混乱中建立新秩序。要想获得和保持和平，就必须使种族隔阂化为阶级联盟，使农村的野心得以满足，使城市的不满得到缓解，使成千上万被拘禁的基库尤人与茅茅一刀两断。战争需要敌人，和平则需要改革。

这一自由主义信条采取了一个新的主题，即“转型中的非洲人”。它将茅茅诊断为一种疾病，提出治疗方案的是英国精神病医生科林·卡罗瑟斯（Colin Carothers）。卡罗瑟斯认为，茅茅是被恶魔俘获了，必须通过公开忏悔、有偿手工劳动、扫盲学习等方式进行净化。^④他对建构茅茅的贡献在于将转型期人们灵魂战争的常识性概念理论化。他以自由主义路径治疗非洲人精神病的疗法所强调的是环境，而非智能遗传的影响，因为他发现茅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心灵不安全的反应。当转型中的人仍然梦想外部有魔力的“意志”力量的时候，可能会失去许多文化支撑。他们的冤屈告诉自己白人所控制的魔力要比他们的强大，于是茅茅便以誓言的形式，承诺重建魔力的平衡。^⑤卡罗瑟斯虽曾指出基库尤人通常不适合转变，但他仍然呼吁主动进行现代化，因为如果茅茅滥用转型期人们心中的困惑，那么就必须要让非洲人对现代性充满自信。

① Baring to Lyttelton, April 19, 1953: PRO, CO. 822/440; Wilson, op. cit., p. 63.

② Rogers, Minute to Gorell Barnes, October 24, 1952; Rogers, Minute to Sir Charles Jeffries, February 16, 1953; Lyttelton to Baring, March 5, 1953: PRO, CO. 822/440.

③ Jeffries, Minute to Lloyd, February 17, 1953: CO. 822/440.

④ Colony and Protectorate of Kenya (CPK),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Annual Report 1953*, Nairobi, 1954, pp. 2-3; CPK,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Rehabilitation 1954*, Nairobi, 1955, pp. 21-33.

⑤ CPK: J. C. Carothers, *The Psychology of Mau Mau*, Nairobi, 1954, pp. 6-18.

就像卡罗瑟斯将茅茅纳入他的转型概念一样，官员们也是如此。他们所谓转型的人就是移民劳工，茅茅与他们一起回了家。贫民窟通过与农村间的不断来往而传染了后者。^① 于是殖民政府试图通过相关计划和数额空前的公共财政将二者分割开来，其中劳工部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从而为社会和城市非洲人家庭创造新的基础，农业部则要求对土地占有制进行不动产改革，以创造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赚取越来越多收入的农村家庭。如果茅茅是发展之初所产生的混乱，那么药方就是让发展最终取得成功。

传教士的观点与此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在与茅茅的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在于改变个人。他们认为茅茅是对基库尤教会的重大考验，它将清除有名无实的信教者，剩下的那些都是将获得重生的忠实信徒。他们认为1929年的“女性割礼危机”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而正是这次危机导致了独立教会和学校的产生，从而激起了茅茅的新的野蛮。^② 因此，就像最初随着教堂的急剧增长而导致的反对一样，茅茅似乎要去击败宗教复兴所带来的新挑战。茅茅因此在他们的眼中成了宗教复兴的对立物。^③

传教团乐意协助政府在拘留营开展康复工作，他们认为忏悔和基督教教化能够拯救那些死去的灵魂。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大多数基督徒都认为他们能够祈祷的是个人皈依，但少数人提出了结构性犯罪的概念。第一种具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性质的方式更具影响力，然而其局限性在当时也显而易见。^④ 在通过招供种族兄弟关系而解决政治冲突方面，最为著名的尝试是所谓的道德重整运动，但该运动并没有获得肯尼亚基督教理事会的批准，而且很快便被废止。^⑤ 肯尼亚基督教理事会曾希望个人皈依，但后来认识到茅茅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甚至精神现象，个人皈依只能是政治转型的附属物，而非替代品。

自由主义信念有助于官员心安理得地开展转变的战争，但其对茅茅的建构并没有为和平打下基础。军队的观点则截然不同，它既不相信自由主义者

① See Margery Perham, "Struggle Against Mau Mau II: Seeking the Causes and the Remedies", *The Times*, London, April 23, 1953. 该文对地区行政官员的观点作了最好的总结。

② CPK, *Education Department Annual Report 1953*, Nairobi, 1955, pp. 39-40.

③ CSM, *Mau Mau and the Church*, Edinburgh, 1953, p. 5; Wanyoike, *African Pastor*, Nairobi, 1974, pp. 175, 180-185, 195f.

④ Carl G. Rosberg and John Nottingham, *The myth of "Mau Mau": Nationalism in Kenya*, New York and London, 1966, p. 340.

⑤ CPK, *Annual Report of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54*, Nairobi, 1955 p. 26.

所谓受控制的改革，也不相信保守主义者所谓强制性的力量。

军队的观点及影响

军队与那些认同现代化这一自由主义神话的人截然不同。厄斯金(Erskine)将军对宣誓持有一种简单的军人式观点，认为茅茅有自己的冤屈和目标，且战略目标与“令人恶心”的手段之间的联系极具理性^①，但该观点使大多数观察者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让人们冷静下来，以便更好地了解茅茅的是基特森(Kitson)上尉，他发现保守主义者对野蛮的妄想对战术情报不利，“乍一看去，宣誓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它充满了‘邪恶’。”但实际上，“吊在棍子上的猫……用刺有羊的眼睛的荆棘做的拱门：一个愚蠢的用来吓唬弱者的稻草人……这简直就是小儿科……整件事情只不过是调皮的小学生的恶作剧。”^②

利特尔顿对丛林战士与英国士兵之间的相似之处感到震惊。作为世界大战的老兵，他尊敬那些“不止一次在烈火和重大伤亡面前攻击铁丝网”的人。如果茅茅的勇气被解释为“酒后之勇……服了兴奋剂”，他在战斗之前不是也用朗姆酒来壮胆吗？^③这种对二者相似性的承认在政治上至关重要。

当厄斯金宣称茅茅需要政治解决而非军事解决后，定居者一直对他不信任。^④但那是一名士兵对最难打的战争——游击战争的反应。而且更重要的是，叛乱者可以通过秘密的、非正规的游击战争来赢得政治斗争。也正因为如此，在肃清了军队内部的政治混乱后，他对战场做了划分，即开展军事行动效果显著的森林与山区交给了军队，将“压力和说服”作用不明确的居民点留给了警察。但最让白人愤怒的是厄斯金不断向森林战士退让，因为这阻碍了他们复仇的欲望。谈判也否定了保守主义神话的两个基本信念，即可憎的宣誓将人变成了野兽和茅茅缺乏理性的目标。^⑤但即便在肯尼亚出生的白人警察也发现茅茅值

^① General Sir George Erskine, despatch, "The Kenya Emergency June 1953 - May 1955", May 2, 1955: PRO, WO. 236/18.

^② Frank Kitson, *Gangs and Counter-gangs*, London, 1960, p. 131.

^③ Lyttelton, Secret and Personal Telegram to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May 18, 1953: PRO, CO. 822/440; Oliver Lyttelton, *The memoirs of Lord Chandos*, London, 1962, pp. 41, 59.

^④ James Cameron, "Bombers? Kenya Needs Ideas", *News Chronicle*, London, Nov 15, 1953.

^⑤ 关于白人的愤怒, See Blundell, *So Rough a Wind*, London, 1964, pp. 189 - 192.

得尊敬，如伊恩·亨德森（Ian Henderson）警官认为“查纳将军”（General China）的精神完全没有问题，他知道自己为何战斗，“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在立法委员会面前阐述他的政治遗言，然后不经审判而走向绞刑架。”^① 查纳的继承人卡勒巴（Kaleba）则将他的目标概述为“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自决权。他们并不认为这仅仅通过暴力就能实现，但他们坚信只有茅茅继续战斗，那些同情他们事业的人才能取得成功”。^② 敌对双方的将军们了解彼此，他们知道自己在政治战争中的弱点，他们希望运用军事压力来强制推行政治和平。

11个“铁杆”拘留犯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在胡拉集中营被打死，这一惨案使英国政府开始赞成军事观点。如玛杰莉·佩勒姆（Margery Perham）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决定证明他们“并没有陷入一些可以治疗的妄想，他们所追求的是合乎逻辑和无可变更的目标”。^③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是拒绝工作，而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政治犯，而非罪犯。按照命令工作将会承认犯了错误，而在任何条件下工作都是奴隶行为。^④ 殖民地政府不同意这种观点，但这已无关紧要。自由主义运动已经无法再指导政策，政治变革已经无法再等待人们悔改和具有政治责任的中产阶级的发展，英国已经无法继续使用暴力来重新建构肯尼亚。^⑤ 政治战争必须用政治手段终结。胡拉集中营惨案后的几个月内，兰开斯特宫开始插手此事，多数人的统治露出了曙光。

肯雅塔的思想与茅茅的命运

重新建构肯尼亚的文明成了一种政治创造，而非忏悔运动。赢得和平的是因挑起战争而被判刑的肯雅塔。政府曾指控他将邪恶强加给了基库尤人，但茅茅绝非简单就能强加的事情，他们是基库尤社会内部严重政治冲突的产物。

^① “Interrogation of Waruhiu s/o Itote, alias ‘General China’”, Kenya Police Special Branch, Nairobi, 26 January 1954, para 14.

^② “Flash Report No. 1 – – Interrogation of Kaleba”, Special Branch Headquarters, Oct 28, 1954, para 37; KNA, DC/NYK. 3/12/24; Jomo Kenyatta, *Facing Mount Kenya*, London, 1938, p. 206; Lambert, op. cit., p. 70f; Leakey, *Southern Kikuyu iii*, pp. 1051 – 1053.

^③ Kariuki, op. cit., xv.

^④ 嘎卡拉·瓦·万焦（Gakaara wa Wanjau）在他的狱中日记就提出了这一推论，See *Mwandiki wa Mau Mau ihaamirio – ini*, Nairobi, 1983; *Mau Mau Author in Detention*, Nairobi, 1988。

^⑤ John Darwin, *Britain and Decolonisation: the Retreat from Empire in the Post – war World*, London, 1988, pp. 244 – 269.

从表面上看，茅茅是一场反抗殖民主义的叛乱，其主要目标是重新获得基库尤人的土地。^① 但对于这一反抗而言，更加重要的因素是茅茅在基库尤兰为爱国美德而长期斗争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卑微的地位。基库尤人的美德存在于农业文明的劳动之中，其主导者为家长。荣誉所倚赖的是财富，而财富是烧林垦荒，清理出可耕作的土地的骄傲成果。在这块土地上，勤劳的寄人篱下的人可能会建立拥有尊严的独立。^② 但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候，大人物不再照顾，而是开始剥削依附于他们的人。工资增长赶不上食物、住房、土地甚或嫁妆等物价的增长。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那些最有理由反抗殖民统治的人基本没有什么责任可以承担，那些可以创造权力的人也无权享受权利。这是基库尤人的悲剧，这是一场围绕阶级构成的道德的斗争，而非精神失常的斗争。

基库尤人所开展的是一场关于阶级的斗争，而非阶级斗争，因为他们事实上还并没有形成阶级。相互争夺政治改革权的是肯雅塔这种有权有势的人和那些无依无靠、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但很明显，除非付出将其成功归之于他们所轻视的人这一沉重代价，否则前者就无法赢得权力。后者，即内罗毕的那些难以对付的人，接管了肯雅塔所了解的团结宣誓，并通过武力、欺骗和劝诱的方式，让那些希望通过无法无天的行动——恩格罗（Ngero）来获得他们所需的人参加宣誓。这些人就是基库尤人所认为的茅茅，不过并非所有参加过团结宣誓的人都是茅茅，但少数参加了第二次宣誓，即战斗宣誓的人肯定是茅茅。^③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肯雅塔一直告诉人们权威只能通过自律的劳动获得。他曾在无数场合公开将那些不再在土地上劳作的人谴责为政治进步的敌人：“如果使用我们的双手，我们就是有用的人；否则，我们将一无是处。”因此肯雅塔也给茅茅下了一个定义。1952 年 7 月，他在涅里（Nyeri）的大庭广众之前将其与小偷和醉鬼进行了对比。亨德森报告称肯雅塔要求人们“携手共谋自由，而自由意味着不再犯罪”。^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或许不应是一个民族主义演说家的观点，这应该是一个基库尤人长者的话语。在基库尤人看

① Philip Mitchell, op. cit., p. 268.

② G. Barra, 1000 *Kikuyu Proverbs*, Nairobi, 1974; Ngumbu Njururi, *Gikuyu Proverbs*, Nairobi, 1983.

③ Rosberg and Nottingham, op. cit.; Kaggia, op. cit., pp. 78 - 115, 193 - 195; M. Tamarkin, "Mau Mau in Nakuru",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17, No. 1, 1976, pp. 119 - 134; John Spencer, *KAU, the Kenya African Union*, London, 1985, pp. 202 - 249.

④ Corfield report, p. 305.

来，自由和犯罪是相互对立的東西。自由是维阿斯（*wiathi*），它不仅要脱离别人独立，它还要自制。犯罪是乌玛拉玛里（*umaramari*）或恩格罗，前者将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归之于儿童时期的不听话，后者则有考试不及格的意思。肯雅塔并不是唯一认为茅茅是罪犯的人，甚至茅茅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利乌德·穆托尼（*Eliud Mutonyi*）也曾如此表示。^① 犯罪之路乌玛拉玛里永远不会通往其对立面——自我约束之维阿斯。

在森林地区，争取尊敬的斗争与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样激烈。游击队员用歌曲记下了肯雅塔的话：“流浪和懒惰对我们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② 或许是出于对滥杀无辜的担忧，他们诅咒那些胡作非为的恶棍。森林里的战士还对性别和社会秩序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他们分成了有文化的人和没有文化的人，前者为能够组建家庭的成年人，后者则将自己视为不到结婚年龄的战士。^③ 甚至在森林这一对外人而言罪恶的根源地区，有文化也正在与令人尊敬的阶级结构联系在一起，受到没有文化的年轻一代的威胁。茅茅内部也面临着肯尼亚其他地区的那种混乱局面。

尽管内罗毕的流氓爬过茅茅的净化拱门去寻找令人尊敬的“成年人的精神”，然后坚守在森林里赢得他们对土地的权利，但他们并没有成功。重新建构肯尼亚以及他们在其中所处的位置是由别人决定的。土地革命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得以展开，当走出森林或拘留营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土地，仍然不是秩序的创造者。当肯雅塔在1961年获释重返政治生活的时候，还是像以前那样保持克制。他的政府所实行的不是流氓统治；茅茅无权在道义上谋取权力。毫无疑问，他想要安抚白人农场主和外国投资者。大多数肯尼亚人，当然包括所有家长，放心地发现肯雅塔仍然站在国内秩序一边。就像他在十年前所做的那样，通过在公众的脑海里再一次将茅茅定罪，肯雅塔再次获得了重新建构肯尼亚的权力。^④

① Eliud Mutonyi, “Mau Mau Chairman”, undated typescript.

② Barnett and Njama, *op. cit.*, p. 180.

③ *Ibid.*, pp. 471 – 478; Waruhiu Itote, *Mau Mau Ggeneral*, Nairobi, 1967, p. 78, 127 – 138. Luise White, “Separating the Men from the Boys: Constructions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Terrorism in Central Kenya, 1939 – 1959”,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ical Studie*, Vol. 23, No. 1, 1990, pp. 1 – 27.

④ Jomo Kenyatta, *Suffering Without Bitterness*, Nairobi, 1968, pp. 124, 146, 147, 154, 159, 161, 163 – 168, 183, 189, 204.

因此，对一个失去土地的出租车司机在两年前所问我的一个问题，应该有很多种答案。“为什么”，他当时有些愤怒地问道，“为什么他们将我们称为乌玛拉玛里？”他们到现在仍然还这么做。白人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或许已经成为历史，但现在许多深受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影响的家长，仍然还在主宰着他们。

Mau Maus and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Kenya

[UK] *John Lonsdale*

Abstrac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u – Mau uprising and Keny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Owing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Kikuyu people and their simmering political aspirations, the British developed four views about Mau Mau: namely, conservative, liberal, revivalist and military. Through the struggl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British government, white settlers and Mau Mau, the view of the military became the guide line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s policy. It argued that Mau Mau had reasonable political demands and political objectives that needed a political solution rather than a military one to resolve them. This view finally cleared the way for peace and majority rule in Kenya. It was Jomo Kenyatta who won political power after dependence, but his definition of Mau Mau made them gain almost nothing out of their struggle.

Key Words: Mau Mau; Kikuyu; Conservative; Liberal;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

(沈晓雷* 编译)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 本文编译者沈晓雷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